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太平经

杨寄林 译注

【上】



中华书局

013040873

B956.1

01

V1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
经典
名著



杨寄林◎译注

太平经 上

B956.1
01
V1



北航

C1648665

中华书局

87801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经/杨寄林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4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9216 - 5

I. 太… II. 杨… III. ①道藏②《太平经》-译
文③《太平经》-注释 IV. B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885 号

书 名 太平经(全三册)

译 注 者 杨寄林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张彩梅 刘胜利 王水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 插页 1 字数 120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216 - 5

定 价 180.00 元

前 言

在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摇曳多姿的形式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化的宝库中,道教文化又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鼎立而三,各领风骚。从汗牛充栋的道教典籍,灿若群星的道教人物,各有宗奉的道教派别,到被视为洞天福地的道教名山,按阴阳五行布局的道教官观,充满瑰丽神奇色彩的道教胜迹;从崇道、重玄、贵生的道教教义,追求长生仙度的道教方术,禳灾祈福的道教礼仪,到体裁多样的道教文学,超逸玄妙的道教美术,缥缈静穆的道教音乐……凡此种种,蔚然构建起土生土长又别开生面的道教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在其创立和孳乳衍化的过程中,既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嬗递、政权维系、社会变迁与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风俗习惯、精神面貌乃至礼仪规范和家庭生活方式,都释放出了其他宗教所不可替代的牵动力和熔铸锻造的能量;又对封建时代的哲学思想、伦理学说、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学、地理学、养生学、医药学、化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给予东亚地区以深远影响。时至今日,道教犹存于世,得到国家尊重与保护,在爱国活动、民俗事象、养生健身、旅游资源利用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而所有这一切,果真沿流讨源,《太平经》便突兀而立,颇具筌路蓝缕、大辘椎轮之功。

《太平经》的编著与流传

《太平经》是中国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真正映现出道教特质与特色的第一部原始经典。这部经典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道教的正式产生,然则决非出于偶然。谓之为三历乱世、杂采九流百术、始创并传承自家“太平学”学脉的最终产物,于史足征。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前48—5),刘氏王朝由衰落趋向崩溃。在这五十三年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税徭役日益沉重,自然灾害有加无已,奴婢和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刑罚越发严酷苛刻,宦官得到重用,外戚把持朝政,在中央权力大为削弱的同时,各级官僚又贪残成风,天下民众陷入了“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境地。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托古改制,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两个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随着对匈奴、西域、东方高句丽、西南句町国的侵略战争的频繁发动,更把人民推入了绝境,于是绿林、赤眉大起义终于爆发。在起义的漫天烽火中,西汉宗室刘秀获取了胜利果实,建立起东汉王朝。迨至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时期(89—167),整个社会的状况又出现了与西汉后期、新莽末叶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太后接连临朝称制,帝王陆续失子绝嗣,又是前所未有的;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迭相专权,误国殃民,更是变本加厉;地方豪强势力扩张,农民人身依附加强,动辄丧失生路,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标志着东汉政权已经处在行将崩塌的火山口上。似此三度乱世的纷至沓来,递次把如何避难脱险的人生大事摆到了世人尤其是下层民众的面前,也向思想界和知识层提出了如何挽救社会危机的严峻课题。而方士和道流作为知识层的一翼,直欲“危更安,乱更理,败更成,凶更吉”,同样著书立说,径予解答,于是《太平经》便应运而生,随之道教实体——五斗米道和张角组建的太平道也以贫民庇护所的面貌先后出现。

汉代的三度乱世为《太平经》及道教的应运而生创设了温床,而最

高统治者所奉行的思想文化政策又为它们的破土而出添加了催化剂。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崇黄老而兼用诸子;自汉武帝时起,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由成、哀历王莽以迄东汉桓、灵,重讖纬而道、佛兼容(通常认为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始传入中国内地)。桓帝于延熹八年(165)、九年(166)遣使去陈国苦县又亲自在京师濯龙宫祠祀老子的升格化举动,更显示出神化老子、推崇修道益寿的倾向。这等思想文化政策的演变乃至蜕变,导致神学说教愈益盛行,方士和道流亦向风而从,与之浮沉,历时一百八十年左右乃使《太平经》得以完整面世。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无不赖有相关的先行思想成果为其前导。《太平经》在创制过程中始终以构建“洞极”太平学为己任,而殷商两周以来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先后涌现与发展变化的九流十家、术数、方技俱臻成熟形态,两汉经学更步入昌明和极盛阶段,致使方士和道流足可紧扣其“洞极”太平学之需而左右采获,锐意取舍,因而贯穿其间的诸如道家的理论精华,黄老道和方仙道的主要因素,汉代讖纬的内学,自《周易》和《尚书·洪范》以降的阴阳五行说,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和大九州说,《管子》以下的气论,儒家的仁论和忠孝伦理观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灾异说,墨家的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某些主张,杂家的刑德论,传统的以天神、地祇、人鬼为系统的鬼神思想,用种种神秘手段祈福禳灾的巫术,专门决疑难、断吉凶的占卜遗法,星占家的天文学,律历家的历数说,汉《易》入于机祥的象数学,医家的人体构造论和养生论以及针灸术、药物学与房中术,诸家所抱持的太平义和皇帝王霸优劣论暨音乐观,直至汉代的民俗禁忌事项和“人口诀辞”等,都被包纳进来而在今存《太平经》中依旧可以考见。

《太平经》环绕其“洞极”太平学的构建尽管在思想上渊源有自,但绝非照抄照搬,无一不予以发挥和改造,由此经历了一个由十二卷蓝本到一百七十卷大道经的完备化过程。时值西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齐人甘忠可撰就《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托名“赤精子”造作符讖,

宣扬汉当火德，亟须应天命，改制度，化解灾异谴告，实现天下太平和帝王长寿有嗣。书成后遂私相传授，但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关入监狱，病死牢中。到哀帝即位后，由司隶校尉解光将甘氏之书奏呈给朝廷。哀帝接受甘氏弟子夏贺良等人的重新受命说，布告天下，改建平二年（前5）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一百二十刻为标准。时过月余因无效验，便将夏贺良等人全部处死。究其实，哀帝“更受命”之举，无异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授受者即术士集团的知国尝试，其书从思想到书名亦直接成为《太平经》的蓝本和嚆矢，且仍在秘密流传，并持续被后世信徒予以扩展、充实和完善。待至东汉顺帝之际，乃有琅邪（今山东胶南西南）人官崇来到京师洛阳，特向朝廷进呈“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境内）水上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嗣后隰阴（今山东临邑西）人、方士化的儒生襄楷又在桓帝延熹九年（166）“诣阙”再献此书。此书即为现今仍可见其崖略的《太平经》。据《太平经·己部·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和《庚部·不忘诚长得福诀》所述，本经的绝对成书年代为延熹八年（165）。既非一时之作，又非一人之作，前后历时“三甲子”即一百八十年，出自众手而成完璧。众手之中，于吉或称于吉，官崇又作官嵩，均系早期较著名的道士，殆为本经的主要编著者。

在编著中，则如《丙部·件古文名书诀》和《己部·拘校三古文法》所言：汇集校理那纵贯“上古、中古、下古”，横包“天文、地文、人文”的“众文诸书”以及民间“口辞诀事”，勒成“洞极之经”、“大洞极天之政事”。具体化便是：“一事分为万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备。”全经到底涉及到多少宗事体，并无确切交代，但据保存基本完整的庚部四十六篇经文已达十万言来作推断，纵使十扣其三，《太平经》总字数亦不少于七十万言，较比儒家整套十三经白文六十五万言尚绰绰有余。其篇幅之巨，卷帙之繁，在东汉以前的全部理论性著述中首屈一指。难怪当时学道真人也在惊讶：“天师陈此法教，文何一众多也？”

书成而意在热切入世和全力经世,决非出世、遁世。规模如此宏大的一百七十卷《太平经》据其自述,则通过亲授弟子、骨干道徒和世间“克志一介之人”或奉道“邮客”之手,以专篇独传、合帙另传、全经付传的方式,分别献呈给“上火精道德之君”,宣达给贤明人士,传布给道团组织,推广至民间,并以“舟流”之势辗转播扬到“万二千国”,亦即使之全球化和世界化。为此而特地定立起“妒道不传”、私匿闭绝经文必遭天罚的“大戒”。于是官崇和襄楷两番献书之举,虽先后被视为“妖妄不经”或“不合明听”,但“乃收藏之”,则当时皇家图书馆肯定已有《太平经》的完整藏本了。与此相并行,太平道领袖、巨鹿(今河北宁晋)人张角“颇有其书焉”,即得到了本经的完本或多本。此前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创立者张陵亦奉持《太平洞极之经》,卷数为一百四十四卷,当属本经尚且处于编撰过程当中的未定本。牟子于汉献帝初年所撰《理惑论》曾论及“神书百七十卷”,则表明士大夫亦见或亦有其书。

迨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身为《太平经》主要编著者之一的于吉已近百岁,仍在东吴孙策开基之地传布本经并创立“于君道”。魏晋时尊奉地仙帛和为教祖的帛家道活动于北方中原和江浙一带,亦致力于《太平经》的承传。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遐览篇》中登载“《太平经》五十卷。又《甲乙经》一百七十卷”,是为道教书目著录本经之始。刘宋著名道士陆修静所撰《三洞经书目录》和萧梁道士孟法师所撰《玉纬七部经书目》,均以显赫位置标举《太平经》。由刘宋至萧齐,山林高士如褚伯玉者“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以致齐高帝敕命当地官府在白石山为他营筑道馆,特意命名为“太平馆”。到梁初,昆仑山(在今浙江上虞境内)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内有黄素,写于君所出《太平经》三部,村人惊异,广于经所起静(道教活动处所专称)供养”。而陈朝道士周智响代表朝廷特至海隅山(在今常熟境内)“祝请”《太平经》并“具礼”供奉于至真观中,且常奉命“开敷讲说,利安天下”,经文自此“盛矣”。显而易见,《太平经》逢遇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越发在朝野内外

得到广泛流传,折射出社会各阶层对太平景象和统一局面的渴望与期待。

终唐之世,忠州(今重庆忠县)平都山仙都观于唐高祖武德中即以《太平经》“镇山”。从《太平经复文序》可知,本经四篇复文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被道士“缮写宝持”,冀求得到行用而“睹太平至理(极治局面)”。其余三百六十二篇经文则与复文“并行于世”,“相辅成教”。而武则天所生章怀太子李贤组织人力在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十二月注毕《后汉书》,屡引《太平经》,并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可证本经仍以全本面貌藏于皇家图书馆。敦煌写本《太平经》残卷载有完整的总目录,足见本经在民间亦有全本流传。直至唐末天复二年(902)之前,杭州道士间丘方远始将全经节录诠次为十卷本《太平经钞》,并编成《太平经圣君秘旨》(又称《太上经秘旨》或《太平秘旨》),使本经由“卷帙浩繁,复文隐秘”变成“备尽枢要”,“文约旨博”,给方外和方内人士提供了莫大便利,同时也丰富了《太平经》的版本类型。

不言而喻,《太平经》在唐代以前自以写本传世。虽已进入雕版印刷术兴盛发达的北宋前期,因其部头过大,迄未付梓,作为秘阁道书的组成部分又被收入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编竣的《大宋天官宝藏》,张君房《云笈七签》仍加选录,并说明“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为“今世所行”。至宋徽宗政和末年(1117—1118),始有刊印《万寿道藏》之举,本经当随之而有完整刻本首次面世。吴曾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154—1157)撰成《能改斋漫录》,其卷十《议论·论皇字》专引本经丙部《三合相通诀》的经文特作反驳,表明《太平经》在南宋初期仍被士大夫所目睹。四十年后,洪迈写成《容斋四笔》,其卷一《十十钱》已称:“其书不传于今。”至宋末元初,马端临撰就《文献通考》,其《经籍考·神仙家》亦谓:“今此经世所不见。”洪、马二氏囿于见闻,不免出言武断,但也证明当时本经流传面确已变得相当狭窄了,而此前金元《玄

都宝藏》经板亦先后遭焚毁，无疑也给本经带来了重大损失，因而到明英宗敕命通妙真人邵以正等校刻《正统道藏》，本经尚存七十七卷，已远非完本，但毕竟属于现存最早的刻本。然而《正统道藏》经板后又惨遭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浩劫也荡然无存，英宗钦赐刊本在北京白云观度藏期间又出现了散失现象，结果涵芬楼于1923—1926年影印白云观《道藏》度藏本时，本经实存五十七卷，约二十二万言。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正统道藏》，使本经更加易觅易得。

面对《太平经》散佚严重的客观状况，当代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于1960年以前广事搜采，精加考校，妥予编排，以《正统道藏》本《太平经》、《太平经钞》、《太平经圣君秘旨》为主，以征引过本经经文的其他二十六种古籍为辅，按“并、附、补、存”四例，撰成三十八万言的《太平经合校》，基本恢复了本经一百七十卷的原始面貌，凸显了本经的主体内容，至今已由中华书局印行了几次，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委实对道教文化研究作出了一大贡献。

合而观之，《太平经》计其流传年代，则自东汉后期以迄当今，历时一千八百五十年之久而不绝如缕。验其流传形式，既有写本、刻本、刻本影印本、现代点校本、丛书本、单行本之分，又有全本、节本、残本、基本恢复原貌本之别。审其流传范围，既有皇家图书馆藏本、道教团体和道观藏本、知识界私家藏本、民间藏本之异，又有鲁豫冀、川陕、苏浙诸多地区即北方与南方之殊。此无他，实由本经颇具生命力而使然。

《太平经》的体例与内容

《太平经》适值东汉的乱离之世而以“主为天谈”、纯系“天语”的名义“应感而现”，专就“世衰乃更为大兴”而出，特为“理天地、安帝王”而生，遂对编撰体例煞费苦心予以设计，使其别具一格。

在书名拟定上，本经或从功效着眼，或从表象出发，或从底蕴切入，

对其涵义做出过七八处自我解说。其中最为完整的一条是：“‘太’者，大也，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这条解说强调帝王要如天之大，似地之平，守行并绝对顺适天生地养的常道，达成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极度协和安平的状态，俨然已给全经所凸现的“太平”主题确立起标尺，定下了基调。循此而进，又名之为“洞极天地阴阳之经”、“洞极之经”、“大乐之经”或“皇天洞极政事之文”、“大洞极天之政事”、“天之洞极正道”、“止奸伪兴天地道之书”。

在书写规则和装帧形式上，本经以《神书青下丹目诀》为题（《敦煌目录》另有《书用丹青诀》），宣布“吾书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青首即在月白色缣帛上特用青绢包头（犹今绢画“护首”），借青色代表流布于东方和春季的少阳木行之气，昭示其“道”主“生”且“仁而有心”。丹目即专用红色书写标题，凭红色代表弥漫于南方和夏季的太阳火行之气和外苍内赤的皇天“正色”，彰显其“道”主“养”而“不欲伤害”。“青首”与“丹目”联为一体乃如“丹青之信”，适成“太阳仁政之道”的象征与标志。对此《后汉书·襄楷传》则载作：“皆缥白素（月白色缣帛）、朱介（界格行线）、青首、朱目。”这种从文字载体质料的择取到书写规则和装帧形式的设计，的确都非常考究，也相当精美，闪映出原始道教的特有格调与神韵，恰恰是对书名涵义中所称天生地养之永恒常道的直接体现，恰恰是对全经“太平”主题的外在张布，无怪乎时人或后人仅凭其书呈现的直观形态便赋之以“清领书”、“青领道”、“青道”、“青策书”等别称了。

在部帙卷数区定上，本经特辟专篇《经文部数所应诀》（凡两见），申说其理据。即：天数“从天下地八方，十而备”，十乃“二千（天干）之始，五行之本”，故分全经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而“一以成十（十

乘十)”，得数为“百”，百已满数，遂与“春响百日”万物俱生相吻合；北斗星斗柄又每年由东向西依次旋转，指向与春、夏相对应的位居前列的东、南空间坐标方位，是为“建”，即万物处于天生地养的阶段。斗柄所指同时便以对冲之势构成斗魁“所系”，系于同秋、冬相对应的位居后列的西、北空间坐标方位，是为“破”，即万物处于成熟和枯死的阶段。其间“阴阳建破，以七往来”，即斗柄依次旋转“七”位恰恰成为“建”“破”在全年内交替循环的分界线，第“七”位又适值申位和农历七月，形成夏秋之交或者说生养与杀藏的临界点。着眼于斯，以“七”乘以天数“十”，再同满数一百相加，故定全经为一百七十卷。如此便“象天地为数，应阴阳为法，顺四时五行以为行”，“随天斗所指以明事”，适可“除恶致善消灾害”，否则便“无益于理世之用”。本经对部帙卷数区定所作的这番专项说明，带有模仿《易》学象数和建除家言的痕迹，但却鲜明地显示出一条实现“太平”的世人务依天法而行的必由之路与既定程式。之所以《太平经》又被称作《甲乙经》，即来自其以天干定十部的部帙划分法。

在篇目组成和文体类型上，本经以其十部一百七十卷的总体架构为基托，撰就经文三百六十六篇，逐篇标列篇数次第，这显然是仿照全年天数而设定的。其中三篇篇目已佚，所余三百六十三篇，若按各自所占比例而论，绝大多数为“法”为“诀(决)”，“法”乃侧重阐发太平学的原理、准则、定律、规制、基本主张、重要举措、行事规范等，但也谈“术”；“诀(决)”则主要对太平学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对亟需排抑的诸多事体事项以及处于疑似之间的各种问题，作出裁决，给出定论，归于“真道正术”。其次为“戒(诫)”，系就修道重大事项和世人恶行劣迹而发，既指点迷津，又予以当头棒喝。再次为“文”为“图”，“文”则属于需要力加申说和特予彰显的紧切文字，“图”则属于图文组配、相得益彰的重在修炼和修身的重要篇章。复次为“敕”，即借至高天神之口所发布的命令，带有人间帝王诏书的性质。此外尚有述“急”举“要”的“记”、究诘辩驳的“难”、综括条贯的“集”，以及不缀文体字样而据义以命篇、因事以拟题

的专篇经文。如此诸体兼具，又在内容表现上交参互涵，且于单篇或两篇或整卷数篇篇末，例作篇旨概括，其措辞几乎均如戊部《天谶支干相配法》“右以天谶长安、国家以治、妖臣绝、奸伪猾灭”这类语句，闪射出异常浓烈的政治色彩。对全经三百六十六篇的具体厝置，又讲求“卷投一善方，始善养性之术于书卷，下使众贤诵读，此当为洞极之经竟者”，随而呈现出单元化与格局化相映互衬、有伦有脊的整体编排特色。正是赖有三百六十六篇经文连鑣并辘，拱立互持，致使本经的“太平”主题落到实处并充分得以展开和宣示。

在表述方式上，本经大都采用授道天师答六方真人问的对话体，也不乏直述体或韵语。往往俚辞纷呈又谶言竞出，显豁得如叙家常，隐晦得令人直入五里雾中。还屡引自然界、社会与日常生活中的浅显事象，多方作譬喻；更每每情激语切，唯恐言不尽意而前后反复申说之处甚多，时而夹杂三两句兴至意到的附带性话语，甚且正在纵论道法，忽又跳出格言，形成一种神乎其神又质直朴实的“重明天谶格法”与“随俗作字”交织融汇的宣讲风格。这种表述方式的独到之处，在很大程度上给本经显扬其“太平”主题，带来了“易敕”、“易晓”的预期效果。

在图像配列上，本经于“己部之十”末尾附有一幅特写式插图，并对画面作扼要解说。于己部绘有三幅蝉联而下的长轴式专题画作，或图自成卷，即《乘云驾龙图》；或图文兼备，即《东壁图》、《西壁图》；三幅图内又均带画面各组成部分的提示说明文字。又于庚部《虚无无为自然图道毕成诫》列有三幅图示，以济文字之穷。这七幅美术作品同已出土的以长生驱邪、成仙升天为题材和主题的汉代墓室壁画、帛画、漆画、画像石、画像砖相较，则别成洞天，凭其所显现出的较高艺术观赏性，进一步深化了本经的“太平”主题。

在复文造作上，完全出自本经首创。总计四篇，共二千一百三十三个。复文即符篆秘文，又称“天书累积之字”，均用两个以上的隶书汉字重叠而成，虽已似篆非篆，化为非字之符，但文字形迹依稀仍可辨认，非

如后世云篆符书那样繁杂神秘。其中撷取了先秦以来君主发兵或传令所用符节的元素,采掇了民间所制避邪物的成分,透泻出古代文字崇拜的意蕴,贯注着天神的威灵之气。每个复文的意义究系如何,现已殊难作出精确剖断,但其篇题以“兴上除害”开其端,“令尊者无忧”承其绪,“德行吉昌”张其帜,“神祐”殿其后,可知是向帝王宣授为政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是向臣民晓谕奉道行德而获皇天善报和密持精修而得神灵佑助的。这与本经的“太平”主题密合无间,且自成单元并玄秘奇异,故而唐初道流便将四篇复文视为“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老子化身之一)创制的“太平本文”,亦即最原始的灵文秘诀,且谓汉代干吉据此“本文”推演成《太平经》这部“一百七十卷”和“三百六十章”的大道经,其实仅可聊备一说而已。

编撰体例是为更系统、更周密、更详明、更恰切、更深邃、更别致地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太平经》旨在解承负,致太平,如车两轮般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负乃系本经创设的乱象险象根源论,即先人罪过递相给后人造成了累积式的蔓延于家族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流灾余殃,非但远而复远、广而复广,抑且深而又深、重而又重,灾变万种不绝,百姓手足无措,社会恶性运行,国家濒临崩溃,直至“烈病而死者,天伐除之;水而死者,地伐除之;兵而死者,人伐除也”。较比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末日审判”还要酷烈。与这种“承负之厄”截然相反,“治致太平”则天安地宁、气和时良、物富年丰、家给人足、兵弭刑措,善兴恶止,“六合同文,万邦共轨”,瑞应悉出,仙寿兼得,整个国家和社会极其清明,极其公平,极其均平,极其纯正。

实现两极对立局面的彻底转化而互易其位,来他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则朝廷所“案用”的“一家法”即儒家学说根本无能为力,其他“义、礼、文、法、武、辩”更无济于事,即如“德”,也仅能起到“章句”式的辅助作用而已。果欲确奏其效,乃非“道”莫属,舍“道”无由。这个“道”,便是本经所构筑和演述的“太平道”。“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

身之宝。近在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国可安，家可富。”可见太平道同“太平经”、“太平文”、“太平学”实属同义语，一事四名罢了。为使之言而有物，更具针对性，既“大信”、“无价”又试用“立应”，达成“洞竟之政”，堪称“万万岁宝器”，便锐意“上为皇天陈道德，下为山川别度数，中为帝王设法度”，由此破天荒第一次创建起中国道教初生草创阶段的独特而又异常庞杂的以“道”为统摄的思想理论体系。其荦荦大者为：

第一，气化气运之道与太平。“气”在本经中层现叠出，俯拾即是，主要指元气及其衍化派生的“众气”而言。“元气”一词最早在《鹖冠子·泰录》中仅见一次，至西汉方使用渐多，本经赋之以宇宙最高和唯一本原的新意义，遂称元气由“恍惚自然”、“上下洞冥”的原始状态，通过“守道”和“行道”，分为“三处：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又谓“气生精，精生神”，随之“天地亦因初始，乃成精神”，即在天、地、人、物构成的物质世界之上复有神灵世界高踞顶端，于是整个宇宙世界便撑立起来。

与元气化生宇宙世界的这一过程相始终，在天、地、人三个层面上便分别被注入并凝聚成“主生”、“好生”的太阳气，“主养”、“好杀”的太阴气，“主治理”、“好成”的中和气。继续扩散开来，“皇天乃以四时为枝，厚地以五行为体，枝主衰盛，体主规矩”。四时气遂交替推移，“传养凡物”；五行气亦递次流转，“传成凡物”。而中和气因由太阳气同太阴气交合而成，屡会“变易，或前或退，故下上无常”。随而诸如“正气”与“邪气”、“善气”与“恶气”、“生气”与“杀气”、“德气”与“刑气”、“悦乐气”与“急怒气”，乃至“灾气”、“凶气”、“害气”、“乱气”、“武气”、“凶年气”、“愁苦气”、“冤结气”、“金钱气”、“财货气”、“寇贼之气”、“逋亡之气”、“小人之气”等，便流布甚且负面充斥于人间世上。

在万物层面上，非仅万物“悉受”太阳、太阴“二气以成形，合为情性”，还“皆含元气”，随元气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且被“上皇气”、“中皇气”、“下皇气”即强度不同的施生阳气决定着“具生”、“小减”、“复

少”的命运。

在神灵层面上，则“神气”化生而兴作。包括反映面容润泽、气力康强的“神气”，周流于心灵脑海间的“疾于雷电”的“神气”，奉天之命“应时而往来，绝洞而无间”的“神气”，“助治”的“四时神气”，象征太平提前到来的“五帝神气”，以及天神仙士所食的“精华气”等，都各尽其用，适得其所。

元气之化及其主要展布形态既已逻辑地组成序列和系统，而元气的动态运行模式也赫然跃出：“天生凡物者，阳气因元气，从太阴合萌生，生当出达，故茂生于东；既生当茂盛，故盛于南；既茂盛当成实，故杀成于西。”或更简单地讲：“阳气起于北，而出于东，盛于南，而衰消于西。”在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过程中，位居“上三部”的“帝气、王气、相气、微气”便首当其冲，列于“下三部”的“死破之气、囚废之气、衰休之气”遂接踵而至，形成生死寿夭、善恶安危、吉凶灾祥的分水岭。而“帝气”纯系“元气建位”，“最尊无上”，为“众气所系属”。众气亦或此消彼长，甲盛乙衰，非进即退，非存即亡。

更有甚者，尚且“远近悉以同象气类相应”并“遥相感动”，俱属“不失铢分”的天地“格法”。言气应，则“王气与帝王相通，相气与宰辅相应，微气与小吏相应，休气与后宫相同，废气与民相应，刑死囚气与狱罪人相应”。言气感，则“好行道者，天地道气出助之；好行德者，德气助之；行仁者，天与仁气助之；行义者，天与义气助之；行礼者，天与礼气助之；行文者，天与文气助之；行辩者，亦辩气助之；行法律者，亦法律气助之”。

从气感、气应上推到气运、气化，便不能不深明元气包天裹地，“所以通天地万物之命也”，非独持其命纲，又“主养以通和”，故须优中择优地把“元气治”置于首位。同时洞悉“天理乃以气为语言”，因人随治出辞，“见于四时”，使人“思惟得失之理”。特别是在“上皇太平气”降临的当代，更要念本根，返太初，绝对“顺气”，牢固“守气”，通盘“调气”，即太

平“至矣”。

第二，阴阳之道与太平。阴阳学说远自殷周之际便已发轫，本经将其列为元气的主要展布形态而力加播扬，续予发挥，紧紧围绕太平进行道教化的总体概括和具体阐发。

阴阳本指物体对日光的向背，后被抽象、提升为表示对立统一关系的一对哲学基本范畴。本经将其形象地比喻成“两手”，既断言“吉凶安危，一由此两手”；又点明“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故在阴阳所涵纳配隶的对象上，反复标揭“阳者为天，为男，为君，为父，为长，为师”，为日，为万物中的雄牡之物，为道，为善，为刚，为贵，为富，为正；“阴者为地，为女，为臣，为子，为民”，为弟子，为月，为万物中的雌牝之物，为德，为恶，为柔，为贱，为贫，为邪。这显然已把社会和政治领域内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代表性事物或现象均已包纳到阴阳的范畴以内，使之进一步细密化了。

细密再细密，本经又加意申明：“天虽上行无极，亦自有阴阳，两两为合。”“地亦自下行何极，亦自有阴阳，两两为合。如是一阴一阳，上下无穷，傍行无竟。”即是说，阳中复有阴阳，阴中复有阴阳，直至无限可分又可配属。以古往今来的君主而论，君主固然为阳，但“第一之君纯生，第二之君纯养，第三之君纯施，第四之君纯刑，第五之君纯杀”。则前三类君主即属阳中之阳，后两类君主即属阳中之阴。这被本经视为“大道”的“喉衿”所在，也成为“无极之政”得以“无有穷已”即持续发展变化的根源所在。

对阴阳的属性与功能，本经也将其愈加社会化了。阳者好生，阴者好养又好杀（此由阴中含阴所致），故而阳者常正，阴者常邪；阳者常在，阴者常无；阳者常息，阴者常消；阳者常实，阴者常虚；阳者常善，阴者常恶；阳者常乐，阴者常怒；阳者常吉，阴者常凶。

由阳者好生、阴者好养的主要属性所决定，势必形成阳施阴化、阳生阴养的基本功能。随而阴阳之间固有的五种关系也确立起来。一则